

doi. 10. 3724/1005-0566. 20250415

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 影响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吗?: 基于 239 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李雪松, 高辛睿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传统生产力发展路径的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资本、资源等要素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为增长而竞争”的政治体制背景下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近年来我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出现增速下滑趋势,以往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遇到严峻挑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基于 2004—2023 年地级市层面数据论证了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内卷式竞争”对地区技术聚集、创新质量和创新成果持续性存在负面影响,但促进了创新投入持续性的提升,最终导致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研究还发现,“内卷式竞争”还会放大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偏差。为此,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视角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内卷式竞争;为增长而竞争;新质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66(2025)04-0183-13

Does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affect the growth of urba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239 prefecture-level cities

LI Xuesong, GAO Xinrui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WHU,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marked by the substantial increase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which is the productivity that breaks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growth mode and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raditional productivit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xtensive economic growth mode relying on capital, resources and other factors input has achieved rapid economic growth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competition for growth". In recent years, the growth rate of TFP in cities has declined, and the extensive growth mode has encountered severe challenges. Transforming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has become a top priority in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city level data from 2004 – 2023,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how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affects urba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t is found that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harms regional technology clustering, innovation quality and innovation results

收稿日期:2025-03-17 修回日期:2025-04-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城市群协同创新带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研究”(23&ZD06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业补贴对环境效率的影响机制与政策优化研究”(20BJL038)。

作者简介:李雪松(1974—),男,湖北襄阳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sustainability, but promotes the sustainability of innovation input, and ultimately leads to the slowdown of loc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This study also found that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also magnifies the devi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setting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ilding a national unified domestic market.

Key words: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competition for growt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其行为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央政府通过构造政治激励和经济激励,让地方政府官员为实现政绩最大化展开政绩竞争,从而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以“增长竞争型政府”来推动经济增长^[1]。与西方国家受到议会、法律、媒体等多重约束的“有限地方政府”相比,我国地方政府并不仅是中央政府的行政代理人,还是“全能型”政府,具有强干预能力直接参与地方经济的发展^[2]。因此,根植于我国特殊政治体制背景下的地方政府竞争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必然会对城市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成为硬道理,传统“为增长而竞争”的模式逐渐暴露出局限性。其依赖目标责任制和考核监督来落实地方政府政策目标,必然诱发地方政府“短视”行为引致效率损失:为争夺有限资源展开激烈竞争^[3-4]。具体而言,在“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格局下,地方政府官员往往会囿于任期和任职地资源有限,忽视所辖地区长远发展或者实际情况而倾向选择易于达成的或上级强烈重视的目标以与其他地区展开竞争^[5],引发诸如产能过剩、过度投资等一系列负面影响,阻碍统一市场形成,影响社会扩大再生产^[6-7]。尽管近年来政绩考察标准逐渐趋向多样,地方政府对于施行传统上大量供应土地、容忍环境破坏等优惠政策“为增长而竞争”的倾向有所缓解^[8],但随着部分“新概念”“新行业”的不断兴起,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经常会忽视市场规律、脱离地方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为厂商提供大量便利政策,这就是所谓的“内卷式竞争”。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的规定做法,制定实施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出台规范地方招商引资的措施”“综合整治‘内

卷式竞争’”,就是为了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市场准入退出、要素配置等方面制约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刘志彪等^[9]指出,目前的“内卷”是反映一种模式达到某种最终形态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使自身转变到新的形态,而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化的现象,这也是目前中国遇到的难以解决的问题。由此看来,所谓“内卷式竞争”实质是一种过度竞争,是指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内部成员通过重复性、无意义的过度投入进行竞争,最终导致整体效益下降。以往“为增长而竞争”以 GDP 为核心目标,试图通过大量土地优惠、税收减免、环境容忍等政策吸引投资,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当前“内卷式竞争”则同样表现为地方为招商引资争夺有限资源(如高端产业、政策试点)陷入低效重复投入。这些政府过度干预行为造成的效率损失都会引起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滑^[10-12]。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产生一哄而上追热点、盲目补贴上项目等违背市场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的“内卷式竞争”行为,正是以往“为增长而竞争”的延续。

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其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因此,深入探究“内卷式竞争”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对于推动地区技术创新,引导地方政府制定更为合理的政策,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本文试图通过检验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解释近年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滑的事实,进而为地方政府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视角出发,丰富了有关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间关系的研究,为诠释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提供了新思路。第二,理论机制方面。大多数研究从要素流动、市场分割、产业升级、政府行为等角度来解释地方政府竞争影响城市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途径。也有一部分文献关注到地方政府竞争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但是并没有形成明确结论,并且把地方政府竞争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归结为单向的,认为地方政府竞争能够促进或抑制区域创新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对于创新的影响不会是简单的单向正负关系,地区经济增长的表现不过是政府竞争对创新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相互抵消的结果。本文提出技术集聚、创新质量和创新持续性三条机制路径,丰富了有关地方政府竞争影响的研究。第三,政策建议方面。本文从推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为政府部门在制定地方政府竞争策略、规划地方政府未来经济发展、协同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等方面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尽管近年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目标逐渐由“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单一指标转向涉及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充分就业、环境保护、社会稳定等多方面指标,经济增长仍然是政府官员晋升的重要考核因素,地方政府仍会为经济增长展开“内卷式竞争”^[13-14],实质上与过去长期存在的“为增长而竞争”模式如出一辙,都是通过大量招商引资、土地开发等手段推动增长,但是收效甚微。因此,有必要讨论“内卷式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理。

国内外学者针对地方政府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展开了大量研究,但并未形成统一结论。部分学者认为,地方政府竞争是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能够有效改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并对区域创新能力起到促进作用,推动经济增长^[15-18]。相反观点则认为,地方政府竞争施行的保护性策略和掠夺型策略,会增加贸易成本,损害经济增长与区域创新效率^[19-25]。也有部分学

者认为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非线性的^[26-27]。综合上述观点,本文认为,“内卷式竞争”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应当存在双向影响:从正向看,一方面,行政放权使得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经济决策权,这不仅增强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使得资源配置更加符合地方实际情况,提高了经济效率^[28]。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间的“GDP 锦标赛”机制促使各地区为了经济增长而展开竞争,这种竞争压力促使地方政府积极吸引外部资本进入,提升辖区内基础设施水平,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推动技术创新,促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9-30]。从负向看,首先,无论是“为增长而竞争”还是“内卷式竞争”都会导致地方政府的短视性执政策略,如减少对于民生等见效慢领域的财政支出,不利于地区长期发展^[31-32];其次,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波动间存在较强关联,不稳定的政策环境不利于创新的持续和质量提升^[21];最后,过度竞争催生寻租活动,企业可能会将获取的政策补贴挪作他用,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33-34]。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1:“内卷式竞争”会影响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鉴于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创新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本文从技术创新的视角对“内卷式竞争”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路径做进一步分析。

从创新的集聚看,“内卷式竞争”的最主要目的还是吸引资源与资本的聚集以满足地方经济发展要求^[35]。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必然会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如提供税费减免、土地价格优惠、技术补贴、人才引进补贴等,以吸引外部生产要素如资金、技术、高端人才等向本地区流动、集聚,正是“内卷式竞争”的本质逻辑。然而,当多个地区同时发展类似产业,地方政府为吸引技术企业和人才通过政策手段对资源进行争夺往往会形成“撒胡椒面”式的资源配置模式,导致资金、人才等资源分散,无法集中力量推动某一领域的技术创新,也难以实现创新资源集聚,形成规模效应。这种情形下,部分地方政府官员为在竞争中获胜还会因冲动忽视自身比较优势产生非理性投

资行为,导致部分行业的财政补贴或间接贷款贴息额度过高,会使一些本应退出市场的企业维持日常经营活动,造成“僵尸企业”数量大幅增加,拖累健康企业的经营状况,“驱赶”创新资源离开本地前往市场环境更好的地区,削弱行业“新陈代谢”的动力^[35-36]。进一步地,“内卷式竞争”的冲动还会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的出现^[37],地方政府为保护当地企业限制、排挤外地企业参与本地招投标或政府采购活动等,造成市场分割和资源配置扭曲,使得高级要素难以在区域间流动,创新生态受到破坏,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38-40]。因此,本文猜想,“内卷式竞争”会抑制地区技术集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提出假设 H2:“内卷式竞争”不利于地区技术集聚,会抑制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上升。

从创新的质量看,由于短期内经济效益较低的创新活动难以增加地方政府竞争优势,竞争意愿较为强烈、较为“内卷”的地方政府会出于快速推动经济增长、显现政绩的考量,将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入那些能够迅速产生效益的领域,而投资回报期较长、收益不稳定、风险较高或难以生产转化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活动难以获取当地政府支持。这意味着创新含量较高或更为重要的企业反而更难获得融资,对整体技术创新质量就会产生不利影响^[41-42]。特别是当出现某些新兴产业时,地方政府为在任期内实现政绩,往往会表现出倾向在显示经济强大或具有新闻价值的领域干预投资决策,如不顾本地财力和实际追求并无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奋力拼抢价高税大的重大投资项目等,并且频繁调整政策内容或力度(如税收优惠、补贴标准)吸引企业落户,致使企业难以制定长期创新战略,增加创新风险。此外,同质化竞争导致地区产业分工趋同,创新资源分散在低水平重复项目中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协同创新,地区间产学研用合作及成果转化等技术吸收效应受到抑制,知识空间溢出效应被削弱,财政科技支出效率降低,都会损害创新质量的提升^[43-44]。因此本文猜想,“内卷式竞争”会通过损害地区创新质量,抑制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上升,并提出假设 H3:“内卷式竞争”会损害地区创新质量,进而影响城市全要素

生产率增速上升。

从创新的持续性看,地方政府竞争的创新效应表现出“短期有效而长期低效”以及“促进增量而难以提质”的重要特征^[45],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发经济增长活力,但其带来的政策不稳定性与不可预测性却对技术创新的持续性构成了严峻挑战,进而可能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创新投入的持续性方面,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为获取更多财政收入,争夺有限经济资源和政治晋升机会,必须在地方经济事务上有着更高的努力程度,包括利用所能控制的手段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去发展本地区经济,为本地特色产业提供更好发展空间。这就意味着,地方政府需要持续投入资金为相关企业提供优惠政策,降低企业创新成本,为其想扶持的企业构建更好的创新生态,吸引企业以创新寻求竞争优势,倒逼生产要素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推动本地制造业高端化、先进化发展。此外,知识溢出效应也能够带来本地企业研发创新能力的提升,促进地区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到促进作用^[46-47]。为引进更先进技术,助推境内企业发展,地方政府会选择利用“科创基金+招商引资”等形式鼓励外来企业长期驻留甚至落户本地以向外借力助推增长。

创新产出的持续性方面,地方政府为了快速响应变化的竞争格局或政策导向,往往频繁调整支持政策,甚至形成“重生产、轻创新”的自利性投资偏好^[48],导致创新主体难以形成稳定的预期和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这种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创新活动面临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影响了创新项目的长期实施和成果转化。即使在近年来中央政府为敦促地方政府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会向地方政府施加政治压力,提出一些刚性要求,如将技术创新指标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将其作为衡量地方政府官员绩效的重要参考,但这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政府的行为扭曲^[49]。地方政府往往用象征性服从的执行策略应对,如只关注专利数量、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等指标,忽视创新的效果或应用,导致“为创新而创新”的现象,企

业难以从创新中获取足够的效益,缺乏创新动力。因此本文猜想,“内卷式竞争”可能有利于创新投入的持续性,但是损害地区创新成果的持续性,最终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并提出假设 H4:“内卷式竞争”对创新投入持续性存在正向影响,对创新成果持续性存在负向影响,进而影响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上升。

二、计量模型的建立、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理论分析部分已经讨论了“内卷式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可能造成的影响,为验证研究假设,本文构建基准回归模型(1),将被解释变量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和核心解释变量“内卷式竞争”纳入回归模型进行回归。

$$TFP_{it} = \alpha + \beta_1 GC_{it} + \sum \beta_2 Controls_{it} + \lambda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1)中,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被解释变量方面, TFP 为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GC 表示“内卷式竞争”。控制变量方面,本文选取产业结构 ($indication$)、城市化 (urb)、经济发展水平 ($agdp$)、卫生基础设施 (bed)、企业数量 ($firm$)、金融发展水平 ($finance$)、交通基础设施 ($road$) 和人力资本水平 ($labour$) 作为控制变量。模型还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 λ_i 和年份固定效应 δ_t , 并将标准误聚类至地级市层面, ε_{it} 是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作为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鉴于 Malmquist 指数法可以衡量相邻两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并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变动,本文选取由 Fare 等^[50] 构建的 DEA-Malmquist 指数法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考虑到 Malmquist 指数反映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本文将基期设定为 2003 年,将 21 年数据导入 DEAP 2.1 程序进行测算^①。

关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指标的选取,学界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本文综合已有研究,同时

考虑到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的综合考察,选取以下维度指标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在投入指标方面:①资本投入。参考单豪杰^[51] 的做法对地级市物质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并将其作为资本投入的衡量指标。此外,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仅公布至 2019 年,本文参考李奇霖^[52] 的做法,采用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roducer Price Index) 来代替缺失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②劳动力投入。采用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之和衡量劳动力投入。③能源资源投入。从能源和资源投入两方面衡量,采用全社会用电量与城市供水总量来分别测度两方面指标。在产出指标方面:①期望产出。包括经济产出和居民生活质量产出两个层面,分别采用省级定基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对地级市名义 GDP 进行平减后得到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和地区绿化覆盖面积衡量。②非期望产出。采用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 SO_2 排放量和工业烟尘排放量作为污染来衡量非期望产出。

相关测算结果如表 1 所示。其中,技术效率变动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动和规模效率变动。

表 1 2004—2023 年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均值

年份	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技术效率变动	技术进步变动	纯技术效率变动	规模效率变动
2004	0.872	1.112	0.784	1.018	1.093
2005	0.805	0.923	0.872	1.016	0.908
2006	1.209	1.093	1.106	1.102	0.992
2007	0.89	1.023	0.871	0.931	1.098
2008	1.243	0.839	1.481	0.89	0.943
2009	0.763	1.158	0.659	1.085	1.067
2010	1.153	0.864	1.335	0.843	1.025
2011	1.072	0.869	1.233	0.976	0.891
2012	0.755	1.343	0.562	1.222	1.099
2013	1.251	1.021	1.225	1.013	1.008
2014	1.037	0.844	1.228	0.933	0.905
2015	0.971	1.068	0.908	1.051	1.017
2016	1.069	1.196	0.894	1.137	1.052
2017	0.806	0.902	0.893	0.89	1.013
2018	1.018	0.978	1.04	1.009	0.969
2019	0.981	1.227	0.799	1.134	1.082
2020	0.925	0.935	0.989	0.976	0.958
2021	1.088	0.699	1.558	0.817	0.856
2022	1.05	1.242	0.845	1.098	1.131
2023	0.804	0.695	1.157	0.85	0.818
均值	0.976	0.986	0.990	0.994	0.992

① DEAP 2.1 是一款运用数据包络法计算的软件,可以用于计算 Malmquist 指数,得到全要素生产率。

指标数值大于 1 说明该项指标在相应时期提高了, 小于 1 说明在相应时期降低了, 等于 1 则说明没有发生变化。图 1 展示了我国地级市 2004—2023 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变动。其中, 横坐标为年份,

纵坐标为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的值。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呈现波动较大, 且近几年增速下降的态势, 均值为 0.976, 结果基本与李媛恒等^[53]、李廉水等^[54]的研究相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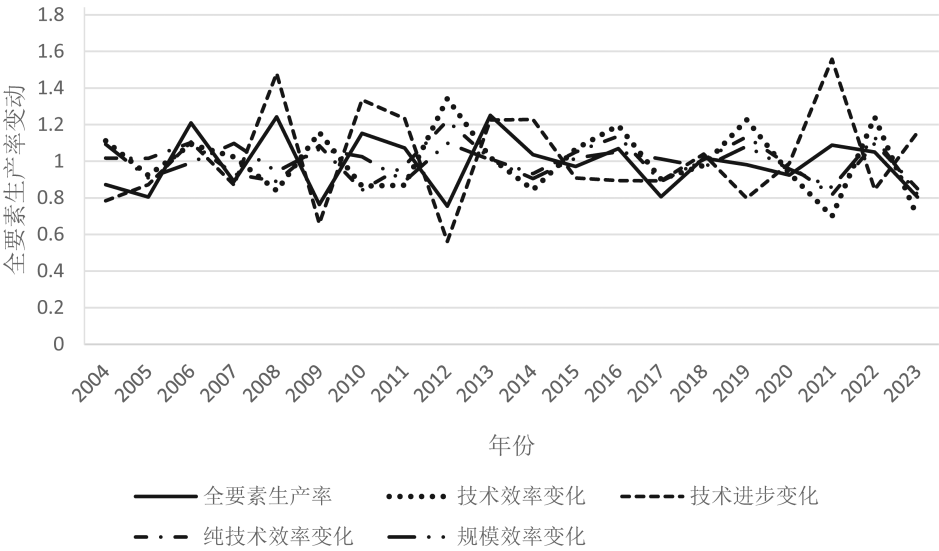


图 1 2004—2023 年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均值变化

2. 核心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方面, 迄今为止, 国内学者研究地方政府竞争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 不少学者针对其做了不同维度的定义, 但无论是纵向竞争还是横向竞争, 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的首要目的还是获取经济竞争优势, 其首位工作就是通过招商引资获取资本资源^[55]。因此, 本文采用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的比重即 FDI/GDP 来度量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行为, 数值越高, 地方政府竞争能力越强。为统一量纲, 本文对其做取对数处理。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是我国地方政府竞争的重要目标, 本文还借鉴储德银等^[56]构建了以 GDP 为基础的地方政府竞争指标, 具体计算公式为:

$$ECU = \frac{\text{除本市外相邻地级市最高人均 GDP}}{\text{本市人均 GDP}} \times \frac{\text{全省地级市最高人均 GDP}}{\text{本市人均 GDP}} \quad (2)$$

3. 控制变量

考虑到其他城市特征因素可能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影响, 本文控制了以下变量: ①产业结构(indication)。城市发展方向的选择与城市产业结构密切相关, 因此城市产业结构也是影响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变量。本文参考汪伟等^[57]用产业结构升级指数衡量城市的产业结构变动情况, 其公式为:

$$\sum Ind_i \times i \quad 1 \leq i \leq 3 \quad (3)$$

式(3)中, Ind_i 表示第 i 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②城镇化(urb)。城镇化水平等于地级市当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镇化政策吸引农村人口迁往城市形成集聚, 城市为容纳更多人口也会相应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 这些都有可能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促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③经济发展水平(agdp)。城市 GDP 能从相当程度上反映城市人才集聚和发展潜力, 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紧密。本文用地级市当年人均 GDP 的对数值来衡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④卫生基础设施(bed)。卫生基础设施的完善可能通过提升城市环境卫生水平、保障居民健康, 间接促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本文采用医院床位增长率衡量卫生基础设施。⑤企业数量(firm)。用地级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表示, 能够很好地反映当地的制度环境和营商环境, 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⑥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金融业

发展水平高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本文选用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对数值衡量金融发展水平。⑦交通基础设施(road)。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较完善的地方,区域间交流更加频繁,要素流动更加便捷,能够优化城市整体资源配置,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积极作用。本文采用公路里程数来

衡量交通基础设施。⑧人力资本水平(labour),用地区高等教育在校人数与地区人口总量的比重的对数值来表示。人力资本水平展现了地区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劳动力素质较高生产效率更高,从而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符号	计算方式	样本量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内卷式竞争	GC	ln(FDI/GDP)	4 780	4.902	1.596	-4.449	9.676
产业结构	indication	产业结构升级指数	4 780	2.273	0.146	1.822	2.761
城镇化	urb	城区人口/年末总人口	4 780	0.251	0.294	0.021	4.550
经济发展水平	agdp	人均GDP的对数值	4 780	1.207	0.906	-1.556	3.299
卫生基础设施	med	医院床位增长率	4 780	0.052	0.109	-0.620	1.927
企业数量	firm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百家	4 780	8.027	14.257	0	415.65
金融发展水平	finance	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对数值	4 780	16.900	1.192	14.871	19.212
交通基础设施	road	公路里程数/km	4 780	12 622.96	74 989.44	248	5 027 672
人力资本水平	labour	ln(高等教育在校人数/总人口)	4 780	-2.375	1.163	-7.432	0.335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4—2023年全国239个地级市(由于部分地级市数据缺失严重,将其从样本中剔除)作为研究样本。样本数据来自2003—2023年各省市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统计局与国泰安数据库(CSMAR),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文选用固定效应模型,采用逐步回归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内卷式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回归系数为负且显著,这说明“内卷式竞争”显著抑制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假设H1得到验证。

(二)稳健性检验

1. 更改被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随机前沿分析(SFA)重新测算了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并对模型进行了重新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第(1)列所示,未发生显著变化,模型是稳健的。

2. 更改解释变量

根据前文分析,本文采用GDP构建的指标地方政府竞争(ECU)替代核心解释变量GC进行重新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第(2)列所示,ECU回归系数显著,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

表3 基准回归

序号	(1)	(2)	(3)
变量	全要素 生产率变动	全要素 生产率变动	全要素 生产率变动
内卷式竞争	-0.008 9 * (0.004 8)	-0.014 7 * (0.008 3)	-0.014 7 * (0.008 4)
产业结构	—	-0.140 2 (0.118 0)	-0.143 4 (0.118 7)
城镇化	—	-0.060 9 (0.051 1)	-0.059 4 (0.051 7)
经济发展水平	—	-0.005 9 (0.024 4)	-0.009 2 (0.028 3)
卫生基础设施	—	0.232 5 ** (0.100 4)	0.233 3 ** (0.100 4)
企业数量	—	—	-0.000 0 (0.000 6)
金融发展水平	—	—	0.039 2 (0.046 5)
交通基础设施	—	—	0.000 0 (0.000 0)
人力资本水平	—	—	-0.000 9 (0.018 1)
常数项	1.250 8 *** (0.023 7)	1.608 4 *** (0.274 8)	0.954 7 (0.795 9)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样本量	4 780	4 780	4 780
调整后R ²	0.000 1	0.002 1	0.001 2

注: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p<0.10、p<0.05、p<0.01上有统计学意义。下同。

3. 更换回归模型

本文通过比较被解释变量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与1的大小构建变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tfpgrowth),如果大于1则给该变量赋值1,说明全要素生产率在这一年内发生了增长,如果小于1则赋值0。并利用Probit模型进行重新回归,结果如表4第(3)列所示,解释变量GC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这说

明在更换回归模型后,回归结果仍然显著为负,通过检验。

表 4 稳健性检验

序号	(1)	(2)	(3)
变量	SFA 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内卷式竞争	-0.000 7 * (0.000 4)	—	-0.025 0 * (0.014 3)
地方政府竞争	—	-0.361 3 *** (0.123 7)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4 780	3 252	4 780
调整后 R ² /伪 R ²	0.094 1	0.866 5	0.033 0

4. 欧斯特遗漏变量检验

一个城市的地方政府竞争意愿或强度可能潜在在受到当地基础禀赋与实际情况的影响,而当地基础禀赋与实际情况同样是影响当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原因。为排除可能遗漏变量对回归的影响,本文参考 Oster^[58]提出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①给定遗漏变量与因变量相关性可与观测变量与因变量相关性的比值 δ (通常设定为 1),以及包含遗漏变量的模型的最大拟合优度 $R_{\max}$ ($R_{\max}$ 取 1.3 倍当前回归拟合优度),模拟得到自变量的系数估计量 β_1^* ;如果 β_1^* 位于基准回归结果中 β_1 估计量的 95% 置信区间内,则表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② $R_{\max}$ 取值方法与①相同,计算使 $\beta_1 = 0$ 的 δ 的取值,若 $\delta > 1$,说明遗漏变量问题不严重,反之亦反。本文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其中,第 1 行是设定 $\delta = 1$ 后得到的 β_1^* 估计量,位于基准回归估计量的 95% 置信区间范围内;第 2 行是设定 $\beta_1 = 0$ 时估计得到的 δ 值,结果显示 δ 远大于 1,进一步论证了模型的稳健性。

表 5 考虑遗漏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	R ² 最大值	判断标准	实际估计结果	是否通过
全要素生产率	0.073 9	$[-0.031\ 0, 0.001\ 6]$ $\delta > 1$	$\beta_1^* = -0.213\ 3$ $\delta = 7.860\ 0$	是 是

5. 内生性讨论

为进一步削弱内生性的影响,本文还采取了如下措施:首先,全要素生产率可能具有长期的影响,即发展一直比较好的城市可能受到前期值的影响而表现出惯性特征,使其未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更高;其次,地方政府的个体禀赋与地理、文化、

环境等因素也可能会影响地方政府竞争的强度,造成互为因果的内生关系。因此,为进一步克服潜在内生性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做了如下处理。①本文首先选取当年除本地级市外全国平均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强度(*ave_GC*)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模型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展示在表 6 第(1)列、第(2)列中,可以看出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有效,且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与基准回归一致,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进一步地,本文采用 Conley 等^[59]提出的近似零方法(LTZ)进行检验,以排除“恰好识别”时难以验证工具变量外生性假设是否得到满足的问题,回归结果如表 6 第(3)列所示,与基准回归类似,本文结论的稳健性得到验证。②本文采用 Heckman 两阶段法进行进一步检验,Heckman 第一阶段的 Probit 回归模型中,首先设置被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否(*tfpgrowth*),计算方式见前文更换回归模型部分,用来表示当年该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增长。为避免工具变量与①重复,本文利用 Bartik 工具变量法构建的变量(*Bartik_GC*)作为工具变量,计算步骤如下:本文计算出 2004—2023 年各地级市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的年平均增长率,并使用样本首年(2004 年)各地级市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强度作为基期值,将其逐年累乘后得到的新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将此外生工具变量加入第一阶段回归模型中,利用此阶段的回归结果计算逆米尔斯比(IMR),然后

表 6 内生性讨论

序号	(1)	(2)	(3)	(4)
变量	内卷式竞争	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内卷式竞争	—	-0.095 5 *** (-0.028 5)	-0.095 5 *** (0.029 3)	-0.012 2 * (0.006 4)
工具变量(<i>ave_GC</i>)	1.461 6 *** (0.116 7)	—	—	—
逆米尔斯比(<i>IMR</i>)	—	—	—	-2.140 1 (4.343 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识别不足检验 (Anderson 检验)	—	0.000 0	—	—
弱工具变量检验 (Cragg-Donald 检验)	—	157.96 > 16.38	—	—
过度识别检验 (Sargan)	—	恰好识别	—	—
样本量	4 780	4 780	4 780	4 780
调整后 R ²	0.083 9	-0.024 7	—	0.025 7

将第一阶段计算的 IMR 代入第二阶段模型进行拟合。由表 6 第(3)列展示了 Heckman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三)异质性分析

1. 行政级别

对于城市行政级别相对较高城市,如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它们的经济实力、基础设施和行政效率等各方面条件一般要优于普通地级市,这些城市在上级政府面前也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因此这些城市在竞争中也更容易取得优势。本文根据城市行政级别进行异质性分析,以探讨行政级别对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行为后果的影响。本文将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城市等级虚拟变量赋值为 1,其他城市赋值为 0,分样本回归。表 7 第(1)列、第(2)列汇报了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受“内卷式竞争”的影响要显著弱于行政级别较低的城市。充分说明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在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中就越容易获利。

2. 城市竞争力

为更全面、真实反映地城市竞争力对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行为的影响,本文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一线城市和其他城市^②,对模型进行分样本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7 第(3)列、第(4)列所示,地方政府竞争对一线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不显著,对其他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是在一线城市发展程度较好,已经形成良性市场秩序和规范地方政府竞争之间的互动,而这种合理的地方政府竞争可以促进本地区与发达国家、发达地区之间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要素流动,从而有利于本地区技术水平和创新水平的提高,从而缓解“内卷式竞争”整体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抑制作用。

3. 市场潜能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企业往往更倾向于将公司位置设置在市场潜能较大的地区,以最大

程度发挥规模效益,节约物流成本。对于上级政府而言,其他条件相同时,市场潜能大的城市对创业者更具吸引力,当地的经济活动也更受到上级政府的重视,就越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竞争的影响。那么,“内卷式竞争”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会因城市市场潜能不同发生改变吗?本文利用 Harris^[60]和韩峰等^[61]的度量方法对各城市的市场潜能进行度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DMP_i = \sum_{j=1}^J \frac{Y_j}{d_{ij}^\delta} \quad (4)$$

式(4)中, Y_j 为城市总收入,为与传统 Harris 市场潜力保持一致,本文采用城市市辖区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衡量; d_{ij}^δ 为两城市之间的距离。回归结果如表 7 第(5)列、第(6)列所示,可以看出,市场潜力较大的地区受地方政府竞争影响较大。

表 7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序号	(1)	(2)	(3)	(4)	(5)	(6)
变量	行政级别较高	行政级别较低	一线城市	其他城市	市场潜能较大	市场潜能较小
内卷式竞争	0.004 4 (0.031 8)	-0.013 0 ** (0.006 3)	0.003 9 (0.009 9)	-0.028 4 *** (0.008 0)	-0.020 8 * (0.011 0)	-0.007 0 (0.008 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60	4 520	2 080	2 700	2 051	2 729
调整后 R ²	0.011 6	0.030 4	0.027 7	0.033 9	0.021 6	0.034 7

(四)机制检验

前文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内卷式竞争”对于抑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影响,在理论分析中,本文指出“内卷式竞争”会对地区技术集聚、创新质量和创新持续性产生重要影响。接下来本文对此进行进一步检验。

为验证“内卷式竞争”与技术集聚间的关系,本文参考白俊红等^[62],采用“(政府科技投入/政府预算总支出)×0.5+人均专利申请量标准化值^③×0.5”构建技术集聚指数(TA),这个指数越高,技术集聚程度越高。

为验证“内卷式竞争”与创新质量间的关系,本文采用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和授权数量占比来衡量创新质量,所占比重越低,说明创新水平或质量

② 参考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 2023 年《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

③ 采用 z-score 标准化,即采用标准差标准化的方式对人均专利申请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越高。具体计算公式为:

$$quality1_{i,t} = \frac{invent_applied_{i,t}}{patent_applied_{i,t}} \quad (6)$$

$$quality2_{i,t} = \frac{invent_authorized_{i,t}}{patent_authorized_{i,t}} \quad (7)$$

式(6)、式(7)中, i 为城市; t 为时间; $quality1$ 指专利申请的质量; $quality2$ 指专利授权的质量; $invent_applied$ 指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 $invent_authorized$ 指授权的发明专利数量; $patent_applied$ 指申请的专利总数量; $patent_authorized$ 指授权的专利总数量。指数数值越高,创新质量越好。

为验证“内卷式竞争”与创新持续性间的关系,本文参考何郁冰等^[63]和郑江淮等^[64]的研究,从研发投入和研发成果两个角度来衡量地区创新持续性,具体计算公式为:

$$persistence1_{i,t} = \frac{(sci_{i,t} + sci_{i,t-1})^2}{(sci_{i,t-1} + sci_{i,t-2})} \quad (8)$$

$$persistence2_{i,t} = \frac{(patent_{i,t} + patent_{i,t-1})^2}{(patent_{i,t-1} + patent_{i,t-2})} \quad (9)$$

式(8)、式(9)中, i 为城市; t 为时间; $persistence1$ 指研发投入的持续性; $persistence2$ 指研发成果的持续性; sci 指地方的研发投入强度,即当地的科学事业费支出; $patent$ 指当地专利授权总量。指数数值越高,创新持续性越好。

根据上述内容构建回归方程如下:

$$TA_{it} = \alpha + \beta_0 GC_{it} + \sum \beta_1 Controls_{it} + \lambda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0)$$

$$quality1_{it} = \alpha + \beta_0 GC_{it} + \sum \beta_1 Controls_{it} + \lambda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1)$$

$$quality2_{it} = \alpha + \beta_0 GC_{it} + \sum \beta_1 Controls_{it} + \lambda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2)$$

$$persistence1_{it} = \alpha + \beta_0 GC_{it} + \sum \beta_1 Controls_{it} + \lambda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3)$$

$$persistence2_{it} = \alpha + \beta_0 GC_{it} + \sum \beta_1 Controls_{it} + \lambda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4)$$

回归结果如表 8 第(1)列、第(2)列、第(3)列、第(4)列和第(5)列所示,发现“内卷式竞争”会有损地区技术集聚、地区创新质量和研发成果

创新持续性,但对研发投入的创新持续性存在正向作用,验证了前文的假设 H2、H3 和 H4。

表 8 机制检验

序号	(1)	(2)	(3)	(4)	(5)
变量	技术集聚	创新质量 (申请)	创新质量 (授权)	创新持续性 (成果)	创新持续性 (投入)
内卷式竞争	-0.013 6 *** (0.004 9)	-0.230 4 *** (0.085 9)	-0.064 5 ** (0.028 8)	-0.038 7 * (0.020 0)	0.044 3 ** (0.022 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4 665	4 203	4 203	4 780	4 780
调整后 R ²	0.772 8	0.743 3	0.720 3	0.775 6	0.038 6

四、进一步分析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制定新一年度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地方政府统筹经济发展、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竞争的影响会使得地方政府官员在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时参考其他同级政府设定的目标值。因此,本文认为,“内卷式竞争”不但会影响当地的全要素生产率,还会影响当地经济目标的制定。本文选择用不同年份各地级市预期 GDP 增长率与实际 GDP 增长率的差值来衡量经济增长差距指标(gdpgap)。此外,考虑到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往往会考虑上一年的经济目标制定情况与地区实际情况,本文选择动态面板模型,用“内卷式竞争”和本年地区经济增长差距对未来一年地区经济增长差距进行回归。从表 9 第(1)列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内卷式竞争”对未来一期经济增长差距指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内卷式竞争”扩大了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制定的偏差。

表 9 地方政府竞争对未来经济增长目标制定的影响

变量	(1)
	预期增长与实际增长偏差的前置项
预期增长与实际增长偏差	0.771 5 *** (0.016 0)
内卷式竞争	0.141 8 *** (0.028 6)
控制变量	是
年份效应	是
省份效应	是
AR(1)	0.000
AR(2)	0.212
Hansen	1.000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1)“内卷式竞争”会导致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

(2)这种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城市竞争力、城市市场潜能和城市财政投入偏向都会影响地方政府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

(3)“内卷式竞争”通过抑制城市创新集聚、创新质量和创新成果持续性,促进创新投入持续性影响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4)“内卷式竞争”影响未来一年地区经济目标的制定,使其偏离实际值。

(二)建议

1. 优化地方政府竞争机制

必须依法规范地方政府间竞争。进一步推动统一大市场建设,从法理上规范地方政府竞争的合理秩序,确保全国范围内资本、技术、人员等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规避以往由中央政府出面协调、纠正地方政府竞争过激行为与地方政府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等现象。中央政府也应进一步优化针对政府官员业绩考核的指标体系,积极鼓励地方政府竞争,增长与协调并重,实现区域经济的整体优化。除此之外,还要加强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要“加强上下联动、横向协作”,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叠加效应,深化东、中、西、东北地区产业协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 加强长远规划和管理

长远规划是确保资源配置效率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保证地方政府有序竞争、互促共赢的基础。一方面,要建立、完善长远规划、科学调控、上下协同的有效治理机制,利用好制度、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丰富人力人才资源等诸多优势条件,统筹协调执行各项政策,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向重要战略领域多布局耐心资本,重点投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等实体经济领域,不断加强虚拟经济领域的投资布局,使耐心资本成为服务于实体经济尤其是未来新兴产业的“领头羊”。耐心资本还应通过支撑中国“产品出海”、中国“企业出海”、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出海”,来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彰显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引擎的重要意义。

3. 提升技术效率 and 创新能力

地方政府必须立足自身特色,积极探索新发展模式,加快先进制造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尽快形成全产业链的成本优势、技术优势,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的动力。具体而言,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激发各类主体的创新活力。优化研发经费投入结构,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性、颠覆性技术研发,加快组织实施和超前布局重大科技项目。二是提高成果转化效率。坚持完善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创新机制,在创新成果评价中,凸显转化程度和应用效果的份额,在科技成果分配中,提高转化机构或个体收益的权重,充分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开展科技创新。三是消除要素流动阻力。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引导要素自由流通,提升要素在城乡、区域、行业间再配置水平。四是释放营商环境潜力。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准则改善营商环境,加快完善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和财政管理体系,将营商环境改善放在评价体系突出位置。

4. 推动市场化改革

地方政府必须重点关注要素市场化配置,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聚焦市场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推出一系列针对性试点任务。如土地要素方面,完善土地用途变更、整合、置换等政策;劳动力要素方面,赋予用人单位更大的自主权,支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政策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鼓励各类人才潜心钻研、厚积薄发;资本要素方面,探索建立中小企业坏账快速核销制度等。数据要素方面,加快完善数据基础制度,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推动各要素领域改革,构建全要素一体化配置的创新服务体系,进一步发挥要素协同配置效应,建立健全生产要素从低质低效领域向优质高效领域流动的机制,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注重效果评估。针对评估结果建立应用反馈机制,对成效明显的地区予以表扬激励,对动

力不足、执行不力、成效不明显的地区要限期整改。通过政策试点、以点带面,以评促改、以评促优,把好的经验做法推广开来,全面提高要素协同配置效率,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康莹,严成樑. 环境规制与绿色转型:基于绿色财税视角的分析[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4(1):29-46.
- [2] 周黎安. “官场+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J]. 社会, 2018,38(2):1-45.
- [3] 吕芳. 资源约束、角色分化与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基于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建设的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 2023,39(2):113-124.
- [4] 何代欣,周赟. 面向绿色发展的税制结构优化[J]. 税务研究,2024(7):26-31.
- [5] 马恩涛,李鑫,姜超.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出预算执行偏差:基于纵向分权与横向竞争的视角[J]. 中国农村经济,2024(1):149-174,187-194.
- [6] LI S, XU N.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and cross-regional capital flow: evidence from China [J].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24(70): 106308
- [7] 刘志彪. 全国统一大市场[J]. 经济研究,2022,57(5):13-22.
- [8] 潘妍,张牧扬,王辉. 未预期减税的环保效应:来自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的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2024(9):42-62.
- [9] 刘志彪,王兵. 中国制造业“内卷式”恶性竞争的发生机制与破解路径[J]. 财经问题研究,2024(12):3-15.
- [10] 刘艳霞. 数字经济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经验证据[J]. 改革,2022(9):35-53.
- [11] 吕冰洋,曾博雯,涂海洋,等. 中国财政可持续性分析:研究框架与综合判断[J]. 管理世界,2024,40(1):1-20.
- [12] 余丽莎,张训常. 国地税合并如何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J]. 经济评论,2024(6):67-81.
- [13] 吕越,张昊天,谢红军. 土地引资、激励扭曲与企业策略性创新:来自工业用地出让的经验证据[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41(8):113-132.
- [14] 赵文哲,董丽霞,曹鉴. 增长目标管理下的地方政府土地竞争[J]. 财贸经济,2024,45(9):60-75.
- [15] 张宽,黄凌云. 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创新能力:如愿以偿还是事与愿违? [J]. 财政研究,2020(4):66-82.
- [16] 何钰子,汤子隆,常曦,等. 地方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结构特征、影响机制与政府激励结构破解[J]. 中国软科学,2022(4):45-54.
- [17] CHEN B, WANG H, WANG X. Innovation like China: evidence from Chinese local officials' promotions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4(86): 102203.
- [18] GUO J, WEI Z, XU Y. Understanding the Catch-up innovation in China: a perspective of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J]. Growth change, 2025(56): e70026.
- [19] 张慧慧,胡秋阳,张云. 纵向分权和横向竞争:行政治理模式如何影响地级市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J]. 财贸经济,2022,43(2):112-127.
- [20] 付强. 规制型政府竞争框架下结构性减速的形成机制分析:基于重工业产能过剩的视角[J]. 中国软科学, 2023(10):190-204.
- [21] 周慧珺,傅春杨,王忾. 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土地财政与经济波动[J]. 经济研究,2024,59(1):93-110.
- [22] 杨华,张丹丹. “经营创新”:县乡关系转型中的乡镇政府行为研究[J]. 政治学研究,2024(1):197-212,310.
- [23] 黄晓琼,徐飞. 云平台背景下科技服务资源跨区域集成与共享中政府行为策略及协调[J]. 运筹与管理,2024,33(7):151-157.
- [24] 潘珂,江旭. 市场化改革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J]. 科研管理,2024,45(2):127-136.
- [25] NIE S, ZENG G, ZHANG X, et al. Does local government debt pressure hamper green transi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J].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2024(84): 1185-1201.
- [26] 孙杰刚,杨军. 地方政府竞争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J]. 经济问题,2023(11):114-121.
- [27] LIU G, GE W, YANG X, et al. Impact of heterogeneous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an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n economic low-carbon transition: new insights from China [J].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conomy, 2024, 30(4): 933-955.
- [28] 杜彤伟,方毅. 省以下分权式改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区县分化的视角[J]. 财政研究,2024(4):85-100.
- [29] 邵帅,范美婷,杨莉莉. 经济结构调整、绿色技术进步与中国低碳转型发展:基于总体技术前沿和空间溢出效应视角的经验考察[J]. 管理世界,2022,38(2):46-69,4-10.
- [30] 丁从明,王聪,陈昊. 优化城市营商环境促进南北经济均衡发展:限制经济秩序向开放经济秩序的演进[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41(1):110-129.
- [31] 余泳泽,刘大勇,龚宇. 过犹不及事缓则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全要素生产率[J]. 管理世界,2019,35(7):26-42,202.

- [32]宋凤轩,张航,宋宝琳. 财政分权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J]. 经济纵横,2023(8):117-128.
- [33]吴金光,毛军,唐畅. 政府研发补贴是否激励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J]. 中国软科学,2022(9):184-192.
- [34]岳文,徐婕妤,倪澄澄.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提高了企业的加成率吗?[J]. 统计研究,2024,41(9):126-137.
- [35]邵帅,尹俊雅,王海,等. 资源产业依赖对僵尸企业的诱致效应[J]. 经济研究,2021,56(11):138-154.
- [36]邵帅,尹俊雅,范美婷,等. 僵尸企业与低碳转型发展:基于碳排放绩效的视角[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39(10):89-108.
- [37]蒋为,龚思豪,李锡涛. 数字企业赋能中国对外贸易方式转型的效率与动力变革:基于中间品成本与需求结构的双重视角[J]. 管理世界,2024,40(9):41-72.
- [38]YUAN H, SONG J, FENG Z, et al. Influence of capital allocation on interregional ine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s: differentiated evidence of investment by the government and market in China[J]. Regional studies, 2024, 58(11): 2038-2054.
- [39]YAO L, LUO R, YI X. A study of market segmentation, government competition, and public service efficiency in China: based on a semi-parametric spatial lag model[J]. PLoS one, 2024, 19(4): e0297446.
- [40]MENG X, DING T, WANG H. Urban resilience under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a new perspective on industrial resilience[J]. Cities, 2024, 155(000): 14.
- [41]申萌,马丽媛,云喆. 基础研究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创新困境的理论解释[J]. 经济科学,2024(6):79-99.
- [42]周城雄. “科学计划”还是“放任自流”:新中国基础研究的概念与政策演变[J]. 中国软科学,2024(增刊1):55-64.
- [43]刘志彪,孔令池. 从分割走向整合: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阻力与对策[J]. 中国工业经济,2021(8):20-36.
- [44]刘若鸿,许晏君. 重点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非合意性趋同”:基于土地市场行业偏向的视角[J]. 经济学动态,2024(6):30-47.
- [45]毛毅翀,竺李乐,吴福象. 竞争到协同:以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J]. 中国经济问题,2024(1):30-45.
- [46]邓晓兰,刘若鸿,许晏君. 经济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J]. 财政研究,2019(4):23-41.
- [47]杜夏依,王子. 外资企业质量优势与东道国产品质量升级:基于中国对外开放经验的量化分析[J]. 经济科学,2024(1):168-187.
- [48]周波,李闯. 政府间环境分权与环境治理绩效:机制梳理和框架重构[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4(11):25-35.
- [49]殷华方,潘镇,鲁明泓. 中央—地方政府关系和政策执行力:以外资产业政策为例[J]. 管理世界,2007(7):22-36.
- [50]FARE R, GROSSKOPF S, NORRIS M, et al. Productivity growth, technical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1): 66-83.
- [51]单豪杰. 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年[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25(10):17-31.
- [52]李奇霖. 宏观经济数据分析手册[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1:132.
- [53]李媛恒,石凌雁,李钰.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测度与比较[J]. 经济问题,2020(3):83-91.
- [54]李廉水,鲍怡发,刘军. 智能化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J]. 科学学研究,2020,38(4):609-618,722.
- [55]蔡昉,陈晓红,张军,等.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笔谈[J]. 中国工业经济,2020(12):5-27.
- [56]储德银,费昌盛,黄暄. 地方政府竞争、税收努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 财政研究,2020(8):55-69.
- [57]汪伟,刘玉飞,彭冬冬. 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15(11):47-61.
- [58]OSTER E. Unobservable Selection and coefficient stability: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2017, 37(2): 187-204.
- [59]CONLEY T G, TABER C R. Inference with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with a small number of policy change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1, 93(1): 113-125.
- [60]HARRIS D. The market as a factor in the localization of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54(64): 315-348.
- [61]韩峰,柯善咨. 追踪我国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来源:基于马歇尔外部性与新经济地理的综合视角[J]. 管理世界,2012(10):55-70.
- [62]白俊红,张艺璇,卞元超. 创新驱动政策是否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来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2022(6):61-78.
- [63]何郁冰,张思. 技术创新持续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J]. 科研管理,2017,38(9):1-11.
- [64]郑江淮,师磊. 本地化创新能力、区域创新高地与产业地理梯度演化路径[J]. 中国工业经济,2023(5):43-60.

(本文责编:希文)